

张振涛  
音乐学研究文集

—— 诸野求乐录 ——

中 国

音 乐 学 研 究 文 库



音乐学研究文集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诸野求乐录：张振涛音乐学研究文集/张振涛著.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11

(中国音乐学研究文库)

ISBN 7-5329-2079-8

I. 诸… II. 张… III. 民间音乐-研究-文集  
IV. J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6390 号

|      |                                             |
|------|---------------------------------------------|
| 主管部门 | 山东出版集团                                      |
| 集团网址 | www.sdpress.com.cn                          |
| 出版发行 | 山东文艺出版社                                     |
| 电子邮箱 | sdwy@sdpress.com.cn                         |
| 地 址  |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
| 印 刷  |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
| 版 次  | 2002年11月第1版<br>2002年11月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br>印张/13.875 插页/2 千字/311 |
| 印 数  | 1-2000                                      |
| 定 价  | 25.50元                                      |

# 目录

## 上 编 采风篇

|             |    |
|-------------|----|
| 冀中平原上的思绪(一) | 3  |
| ——日久见人心     |    |
| 冀中平原上的思绪(二) | 12 |
| ——城里人与乡下人   |    |
| 冀中平原上的思绪(三) | 18 |
| ——喜忧参半      |    |
| 冀中平原上的思绪(四) | 25 |
| ——我心中的管子    |    |

|                |     |
|----------------|-----|
| 洞庭湖采风断想之一      | 32  |
| ——渔歌           |     |
| 洞庭湖采风断想之二      | 38  |
| ——铭记于心的歌       |     |
| 西南采风纪程         | 46  |
| 榆林葬俗中的唢呐乐班与吹鼓手 | 51  |
| 走进西部 体验仪式      | 174 |
| 酉阳行            | 226 |

## 下 编 案头篇

|                             |     |
|-----------------------------|-----|
| 中国传统音乐煞声问题的乐学研究             | 261 |
| 板眼体制与记谱方式                   | 335 |
| 关于术语系统与传统乐学理论的反思            | 349 |
| 乐音材料的相同性与听觉习性的相通性           | 364 |
| 黄翔鹏的乐律学研究与民族音乐型态学           | 368 |
| 论恩主                         | 393 |
| ——关于中古伎乐发展阶段乐户与庇护者依附关系的初步探讨 |     |
| 暗把金针度与人                     | 416 |
| ——《实地考察与戏曲研究》读后             |     |
| 来自香江的报告                     | 426 |
| ——“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讨会”侧记           |     |

采 上  
风 篇  
篇 编



# 冀中平原上的思绪（一）

——日久见人心

Stephen Jones 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授，他的中文名字“钟思第”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阴法鲁教授给起的，“钟”与他的父姓 Jones 同音，也与他从事的音乐有关，一字双得，有声有意。“思第”也从他英文名字的发音而来，寓意是，“思”盼早登科“第”。这当然非常文人气，但我们常常把它解释为民间化的“思弟”，就是盼着生个男孩的意思，并再附加一句：“注意计划生育。”又因大家常称他“老钟”，他就自称“闹钟”。每次他觉得麻烦大家，就自我解嘲：“‘闹钟’又来‘闹’你们了”。

“闹钟”确实把我们“闹”了好几年。1993 年，钟思第向“英中友好协会”申请到一笔资助，开始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携手，对河北省中部和北京、天津郊县的民间音乐组织“音乐会”，进行了一次为期数年的普查。这期间，他每年都到这一地区进行一两个月的采访。由于他早就从事

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涵容中国器乐，并出版了精美的、为他赢得国际声望的著作《中国民间乐社》（*Folk Music-Living Instrumental Traditions*），所以，对民间乐种的背景知识，已有相当积累。与国外音乐学家一起合作，从事一个地方乐种的研究，使我们有机会感受西方音乐学家进行田野调查与个案研究的方法，并在采访中感受到局外人析疑的冷静细致，这些常常是近于挑剔的诘问，局内人司空见惯、不太介意的细枝末节，有时恰恰揭示出了问题的意义。这是对一研究对象采用局内、局外两种目光同时搜求才有的全面。

阐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强调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观察研究对象，但是，通过哪种不是问答式的访谈而是自然表现出来的行为可以捕捉这些信息呢？观察农民乐师对待钟思第的态度，是我可以搜求到的用以验证自己判断的途径之一。他与音乐会会员建立的友谊，引起农民乐师们的强烈情感表现，使我捕捉到民间乐师如何评价自己的音乐，怎样看待自己社会地位的心理底脉。通过一个外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观察，借助他的眼光和自己文化圈中被观察者对待这位境外观察者的态度，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深刻认识，也成为我披纷探本的视角之一。

保定市（原保定地区）涞水县义安镇南高洛音乐会是我们落足的长期固定采访点，也是钟思第与会员们建立了最深厚友谊的乐社。个个会员家中，都挂着与钟思第的合影，这是他们与一位外国朋友照过的唯一的一批照片。我们看到，凡有外村亲戚串门，他们总是充满自豪、在对方惊异的目光与赞叹中，说上两句这位“老外”的笑话、故事以及与他们们的友谊。

钟思第与农民乐师建立的这段非同寻常的友谊，是以

“实际行动”推动着始则提防、继而信任的关系。1995年冬，音乐会会头何清，身染沉痾，不久于世。我们看他时，已是展转衾席，卧炕数月。由于身体的左边不能受压，他只能向右躺着，背对我们。因不能转身面叙，他不断地唠叨着道歉，泪流不止。他的话，因体弱声微，互不连贯，很难听懂。管会人之一单玉德伏身过去，耳贴何清，再回过头来向我们传译：他让钟思第吃点自制的花生粘。钟思第为他买了900多元的药品，这贫穷得买不起药、眼睁睁瞅着病情恶化的一家人，看到钟思第的雪中送炭，感激之情，难以言喻。何清的女儿请我们去吃饭，临走时，还特地送来一麻袋花生和一塑料袋鸭蛋。我们婉言谢绝了袋高半人的花生，带回了体小量轻的鸭蛋。钟思第不失英国人的幽默：“我花了1000元钱，才买了一塑料袋鸭蛋！”何清最终还是去世了，但钟思第济人所难、助人药石的行为，却感动了音乐会的全体会员。一位英国教授与一群中国农民乐师的信任和交情，就如同这鸭蛋，敲破那层隔着的皮。

1996年，音乐会的所有神像被盗，会头们如临灭顶之灾。村里人七嘴八舌，说那英国人就是为这些值钱的神像而来的，神像不翼而飞，他也就一去不返。会头们决定给钟思第写信，希望他能再来一趟，反击那些说三道四的人。钟思第没有让会头们失望，践履秦约晋盟，春节时准时来到南高洛。会员们大喜过望，钟教授的仗义，再次证明了他与会员们不以利趋、但求爱乐的君子之交。患难识真情，日久见人心。老钟又赢了一回人心！

1995年，我与钟思第在南高洛度过春节后准备返京，会员们为他装裱了一幅书法。大家聚集一起，由蔡安、蔡玉润、单伶缓缓地舒展条幅：“沧桑古乐几凋零，细雨春风吹

又生。华夏正声传海外，首推钟思第一功。”诗中末句，藏了他的名字。钟思第被意想不到的礼物惊喜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因为男人的矜持而没有落下的泪花，在眼眶中滚动着。乐师们也因为精心策划的礼品引起接受者的感动而感动着。大家似乎只是无言地看着这幅书法，实际上都在静默中控制着各自的感情，一开口大概就要听出哭声来了。一个英国学者与中国农民的友谊，在这一分钟（也许只有几十秒）被填充得扎扎实实，或许这可以列为那类令浮士德追求了一生的永恒瞬间之一。

1998年，钟思第告诉南高洛的会员们，他已经完成音乐会的普查与研究项目，就是说，以后就不能像这几年一样，隔三差五地来见上一面。这些人老爷们儿的反应，竟然是抱头痛哭，像情人分别一样。钟思第返回北京后，这些心里放不下的村民，竟也紧跟着追到了北京。那种依依不舍的劲儿，简直令人觉得，如果可能的话，没准他们会跟到伦敦去。

如果不把这些场景仅仅作为感人的故事去体验，而是从研究农民的学术话题理解其意义，就使我们体会到：农民乐师是多么看重一位认真解读他们文化的使者，甚至把这类肯定，寄托在一位迟早要离去的远客身上。无疑，这位外宾提醒了连他们都没有认真认识的、自己手中的音乐具有的价值。这价值，是他们自己曾经怀疑过的，但现在，则容不得别人有任何怀疑。

管会人之一蔡然总结道：钟思第来南高洛后，对音乐会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特别是年轻一代，开始有人学了。原来音乐会活动已不太正常，会员们思想不一致，都不愿搞了。现在思想统一了，组织凝聚了，活动也常规化，没人不

参加。原来会员们觉得，干这行抬不起头来。老百姓看实际。从一个英国人可以来到这里，村民们看到改革开放的政策落实到了农村，这是中央政策的具体体现。钟先生的到来，让村里人、特别是音乐会会员，看到了时代的潮流。

我们问：钟思第来后，村民开始看得起音乐会会员，有什么具体行动？

蔡然举例回答：原来出会要借部车很难。平常乡里乡亲，关系很好，私人借车，也不会跟你要钱。但说到音乐会借车，就不理你了，一定要谈钱。现在不同了。音乐会出会借车，村民们不再要钱。这说明，钟教授来到后，村民们认为音乐会光荣，为音乐会做点事，不丢人。连外国人都看得起音乐会，三天两头往这里跑，我们脸上有光！钟先生的到来，让村民看到了整个形势的变化。我们现在也不说为谁服务之类的大话，但希望有人尊重我们的人格。

蔡然在外服役多年，曾任村支部副书记，说出的这些话，充分显示出他的政治分析能力，讲得有理论有依据，颇有说服力。他的言外背景是：多年来的政治运动和宣传，使老百姓误认为音乐会是个与旧式习俗紧密联系的迷信组织，这些习俗早已过时。钟思第的到来，则让老百姓感到，音乐会并非他们从破旧立新的宣传中得到的那些印象和推理出来的结论。普通农民眼里，高鼻子的外国人，总与“文明”一词联系在一起。他对音乐会感兴趣，与会员们交朋友，无疑是为音乐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作了十分具体的说明。会员们为有个外国朋友而感到自豪，这一点在年轻会员的表情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位英国教授，在会员们家里吃，在会员们家里睡，这些是普通农民觉得被人瞧得起的行为，显示了民间乐师渴望被专业音乐家承认，被现代社会接受，被人

看得起的强烈愿望。

钟思第是一个象征！他的高鼻深目、黄发白肤，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西方的强势文化，象征着专业的音乐水准，象征着学者公正的判断和评价，象征着城市人、而且是伦敦人的艺术品位。

这个集聚了这么多项象征的人物，频频出现在会员们家中，就等于向全村人宣布：音乐会是与这位象征人物所象征的那些事务一样的组织：它具有国际认可的专业水准和高级的文化档次，可供中外学者认真研究，而决非一般的俗文化或僵死的古董。这些认识，不是来自官方解释的、农民文化中含有的古老传统与民间风格等等，而是直接对应于钟思第的身份——一个从体现着西方文化最高水平的国度——英国来的学者。因此，演奏这些音乐的人，也就是真正的艺术家，掌握着值得自豪的技术和传统，不如此，怎么与艺术品位、档次相应的人交流切磋？

经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调查研究而扬名天下的屈家营音乐会的会员，也彰显着同样的情愫。那些一生所见官员从未超过村长的农民乐师，一下子面对数十位部长级的京城高官、外国使节，省、市、地、县、乡政府的官员，一大堆国家最高研究机构和音乐学府的教授，中央电视台和各大新闻媒体的记者。他们恭恭敬敬、又浩浩荡荡地乘着“红旗”、“桑塔纳”、“奥迪”，拥进这个一向只有马驾牛辕、静如止水的小村庄，在会员和村民的生活中，激起轩然大波。来客们与乐师们同桌共餐，频频举杯，至少表面上显示出对他们艺术的重视态度，这是他们连做梦都未曾想过却梦寐以求的事。数家音乐会从电视和电台闻知屈家营的情况后，陆续来找中国音乐研究所，希望被采访。渴望成为关注中心并

得到国家文化机构承认的心理，反映着这个古老乐种的从艺者们，对自己生存环境的焦虑和为自己正名的企盼。我们对采访的近百家音乐会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也起着这种作用。正如蔡然所说，隔了20多年的闭关锁国之后，这个大鼻子能够大大方方地走在冀中平原的村路上，在农家里没人钻出，真是体现了“中央的开放政策”。与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英国学者，无意中为中国政府的民间文化政策起了现身说法的宣传作用，也是始料未及的事。

钟思第自学笙管，每次采访总不忘请教农民乐师，虽然我们总笑话他吹的管子如同苏格兰风笛。他背诵了许多工尺谱的大曲曲牌，在雄县，我们每天到韩庄乐社77岁的解永祥先生家学韵工尺谱，直至村里的治保主任盘问纠缠为止。这种认真习摹异国文化的精神，是中国的音乐学家们应该学习的。我们有几个人能够韵唱工尺谱，参加到农民乐师的乐队中一起演奏笙管？中国的谱子，中国人说它落后，就是落后也得学，因为这是中国音乐学家的职业。我们常常开玩笑：下一代中国音乐学的学子，大概要到伦敦采访钟思第“老艺人”，学习工尺谱的“阿口”了。

对于中国音乐学家过分依靠文献，忽视长期持续地从事实地考察的积习，他常提出批评：“音乐技术性问题，是坐在图书馆里永远找不到答案的。”他重视实践且亲身实践的研究方法，给我上了难得的一课。以它种文化做参照，超越观照者自身的文化成见转而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缺点，是非要触动顽习不可的。

长期的农村生活，磨练了钟思第，使他越来越中国化。初在农村吃饭，他总是应付地吃上几口，晚上回到县招待所，再补充一大块巧克力。后来住到农民家，就不便如此

了。于是乎，与我们一样大嚼那些案板上刚刚落满一层苍蝇、擦两把就切菜的农家饭，端起炕桌上的、也许哪个农民刚刚用过的大碗一仰而尽地喝凉茶，对农家那些与猪圈连体的厕所，也昂然不惧、如入无猪之境。有时甚至比我们还能适应环境。在易县流井乡马头村采访朝顶仪式时，晚上寄宿村民梁树明家，盖着一床大概几年未曾拆洗、勉强可以称做被子的棉絮，竟然刚刚躺下，就从他的大鼻子里发出了均匀的鼾声。而我却因为那刺鼻的酸味，彻夜未眠，以至第二天他精神抖擞地采访时，我几乎是只字未录，只是躺在善良的魏国良老汉放牧的羊皮袄上，用决不次于他、至少是相同的调高，响应他昨夜的鼾声。

钟思第最讨厌的事，莫过于被人宴请，中国人饭局上的海阔天空、冗长漫延，对不远万里因而惜时如金的学者来说，当然避之惟恐不及。一次在易县桥头乡陈旺村音乐会采访完毕，会员们定要请吃饭，他一听就赶紧上车，想逃之夭夭。但主人不允，简直连拉带扯，硬把我们拖下车。他已十分恼怒，满脸通红，忍无可忍。局面有点尴尬。我只好把他拉到一边，向他解释：这家人从我们进屋就开始备菜，你走了，他将在全体会员、甚至是全体村民面前大丢面子。再说，饭桌也是采访机会，借着酒兴，他们全无避讳，卸下武装，会里的事，都会讲出来。钟思第迅速改变态度，高高兴兴返回屋里，与会员们饮酒吃饭。这件小事，让我十分感动。在大都市的紧张生活中，啃个“热狗”和“三明治”式的快餐就投入工作、养成快节奏的伦敦人，面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缓慢步履，能够立即调整深入骨髓的习性、自我强制地适应中国农村的风俗人情，理解一个普通农家既真诚又多少有点虚荣的心愿，确乎勉为其难。

奔访四境，不免劳倦，无时不乏幽默的英国人，常以他的民族精神带给我们阵阵笑声。一次到一家农户采访，我们鱼贯而入，一只老狗懒洋洋地趴在门口，连抬头看我们一眼的兴趣都没有。然而，也奇了，钟思第一走过来，它奋然起身，狂吠不止。这条老狗大概从未嗅过“洋味”，因而宽内欺外。钟思第不屑地说：“哼，这条爱国主义的狗！”

钟思第热爱音乐会，常开玩笑地说：“英国应该拿河北替换香港，我出任总督。总督府里的乐队，定为笙管乐，每日早朝，开始演奏。那样，音乐会定不失传。”这些当然不含殖民色彩的笑话，虽然不过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家的幻想，但也反映了他对音乐会的情有独钟。

钟思第常常白艾：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多选择一个视域变换的采访点，或风景饱妖的云南，或水碧山岚的福建，或雪峰簇簇的西藏。冀中平原，千顷平畴，光景如一，除了土还是土，一百个村庄都一个样，我怎么就选了这么一个平淡无奇的点？话虽如此，每次足落燕赵，却都有再归故里、生出“不知何处是故乡”的恍惚。在荷兰莱顿运河的游艇上，迎着丝丝凉雨，他还为南高洛音乐会一位刚刚去世的会员而哀悲良久。一恍数载，冀中平原上的风卷黄土、烈日冷月、残雪碎冰，连同这些飘浮在那一模一样村庄中的笙管乐，渐融在他那分析冷峻却不失深情的著述中。

写于香港沙田中文大学新研究生宿舍 A301 室

（原载《人民音乐》，2001 年，第 10 期）

## 冀中平原上的思绪（二）

——城里人与乡下人

我们这些在北京城里享受着汇聚于一国之都中的现代文明的文化人，下到穷乡僻壤，多半会在步下汽车的那一刻，从聚拢而来的乡下人打量我们装束时流露的羡慕表情中，从好奇的孩子们观察我们挂在身上的摄像机或许偶尔触摸一下时战战兢兢的敬畏中，享受一下城里人的优越感，体会一下人人渴望而非人人可及、高人一等的满足欲。这些城里人一生追之逐之的感觉，在城乡差别的落差之间，确乎得到一点满足。随着返回市区，随着化为城里的普通一分子，这些感受就会淹没在芸芸众生的相互倾轧之中，因而显得多么无聊。而要真正破除这类无聊，还确乎有点难。并非只有你方的一厢情愿，落差的另一方，有时并不接受我们希望他们应得的平等。

一个想融进被采访群体的采访者，如何让被采访者接受自己，使被采访者视采访者亲如一家，平等相待，并非是件

简单的事儿。谁都知道，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相互间若有个高低之分、贵贱之别，就难以沟通。你若摆摆谱儿，就什么也得不到。有些体验，是必须化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时才能体会得到的。尽管有政府多年推行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大众密切关系的教导与行政命令，但政府多年来执行的对农民不利的政策以及经济生活的差别，使农村人与城市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隔阂，这绝非一天两天、一人两人就能弥补的。我们的身份所体现的生活背景，时时提醒着他们，保持适当距离。

1996年正月，我与钟思第在涞水县义安镇南高洛村采访，住在音乐会管会人之一蔡安家中。几天来，在各个会员家轮流吃饭，每天晚上，总要与蔡安聊至深更半夜，直到满屋子是烟为止。这些长谈使我觉得我们之间已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可以让他相信我们是真心尽力地清除着城乡之间的隔阂。

正月十五的晚上，在“官房子”里听音乐会演奏，中间休息，出门如厕，返回蔡安家。一家人正在屋中吃饭，隆冬中的小院，冷冷清清。贴近屋门的一侧，摆着一张折叠圆桌，上置香炉，内插三炷香。燃香的袅袅清烟，飘绕在空无一人的小院中。

我被这突然遇到的祭坛吓了一跳。进屋问蔡安，正月十五，家中设祭的传统，你怎么没有提起过？他不安地、也不好意思地说：“一家人过年，图个吉祥，不值一提。”他的表情，流露着那种被人窥见隐私时的尴尬、难堪。我感到他的为难，快步退出屋门。

我突然意识到，不管住多长时间，怎样表现出关系密切，努力消除隔阂，他们仍然把我们当做城里人，所有那些他认为城里人定会认为是“陋俗”的生活方式和细节，都不